

伊斯兰思潮研究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主义^{*}

李文刚

摘 要: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发端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这一区域。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既受外界因素影响,又与非洲国家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多党民主化风潮、经济社会欠发展以及民族国家构建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密切相关。虽然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不会改变非洲伊斯兰教总体温和且具包容性的大局,但其对非洲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伊斯兰主义在非洲会长期存在,但因自身矛盾重重,加之近年来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其遏制和打击力度,长远来看,伊斯兰主义在非洲难有更大发展。

关键词: 非洲伊斯兰教;伊斯兰主义;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极端势力

作者简介: 李文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2-0077-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宣布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该事件被认为是当代伊斯兰主义^①兴起的标志。随后,伊斯兰主义在一些西亚北非国家迅速蔓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奉行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和运动在多个国家亦不鲜见,甚至呈泛滥之势。一些伊斯兰主义组织甚至发展成为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其中以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最具典型性。当前,国内学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态势关注较少,本文主要

*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应对”(16JJDGJW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国内外学术界对“伊斯兰主义”的概念界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且经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来强调该现象的某个方面,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好战的伊斯兰(militant Islam)”、“伊斯兰主义(Islamism)”、“伊斯兰极端主义(Islamic extremism)”等。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多采用“伊斯兰主义”的提法。

分析伊斯兰主义在非洲^①的兴起、发展、影响及制约因素,以丰富对伊斯兰主义问题的研究。

一、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兴起及发展

一般认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核心是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② 具体来讲,伊斯兰主义是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伊斯兰化”的途径或以渐进的合法手段或突变的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创建一个以“真主之法度”为基础、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秩序的过程。^③ 但事实上,这一政治理想明显与当今世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相悖。有学者归纳了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几大特点:强调正本清源的同时,主张与时代潮流相趋同,试图把西方有用的东西结合进伊斯兰教,或者根据伊斯兰教精神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具有非常强烈的夺取政权的政治意识;在坚持“圣战”手段的同时,充分利用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议会斗争等现代政治斗争手段;基本骨干已不是传统的乌里玛阶层^④,而是一批非职业的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⑤ 也有学者指出,那些接受现存政治制度并以各种方式进行政治参与的群体,不应当再被称为伊斯兰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再谋求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⑥ 上述观点对深入理解当代伊斯兰主义颇具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就非洲国家而言,形形色色的伊斯兰宗教组织或各类伊斯兰主义运动所采用的活动方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所区别,其中既有以温和方式致力于社会伊斯兰化的,也有试图通过选举掌握国家政权的,更有直接诉诸暴力行动的。上述现象反映了伊斯兰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 西非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西非地区是伊斯兰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⑦ 历史上,伊斯兰教通过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贸易活动、伊斯兰学术交流以及朝觐等和平方式传入西非,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近 1.8

① 非洲大陆粗略可以划分为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俗称“黑非洲”)两大部分。北非通常被认为是更广阔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常常有“西亚北非”的说法。本文论述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问题。为行文便利,文中的非洲仅指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北非。

②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7 页。

③ 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载《战略与管理》1994 年第 3 期,第 27 页。

④ 乌里玛(Ulema)是指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阶层。

⑤ 陈德成:《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探析》,载《西亚非洲》1995 年第 4 期,第 25—31 页。

⑥ Robert Woltering, “The Roots of Islamist Popula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3, No. 6, 2002, p. 1134.

⑦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非洲与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关系非常密切,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亿),穆斯林人口约占 50%,主要聚居在尼北部地区。1803 年,今尼日利亚北部一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圣战”运动,建立起索科托哈里发国。英国殖民当局在尼日利亚北部推行“间接统治”,执行过伊斯兰教法。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西方世俗法律,规定伊斯兰教法仅适用于北部穆斯林的家庭事务。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沙特宗教外交的影响下,尼日利亚北部也出现了强劲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北部穆斯林呼吁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尤其是在法律层面执行伊斯兰刑法,由此引发的宗教、民族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00 年,赞法拉州州长萨尼·耶里马率先宣布在该州实行伊斯兰教法。随后的两年间,尼北部 11 个州纷纷仿效。起初,一些穆斯林认为,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可以恢复联邦政府和警察无法保证的社会秩序,抵制西方文化价值对尼日利亚传统文化的日益侵蚀,保证尼日利亚广大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认同。尽管伊斯兰教法强调政府对民众的责任,但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州大多仍处于贫困状态,无以为生的穆斯林青年很容易将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以极端方式发泄出来。此外,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一些酷刑也引起穆斯林民众的不满。在卡诺州和赞法拉州等地,“希斯巴卫队(Hisbah Guards)”^①在州长的支持下常常对普通穆斯林民众施以酷刑,并同联邦警察多次发生冲突。2006 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希斯巴卫队”为非法组织,并逮捕了一些州“希斯巴卫队”的领导和成员,引起这些州州长的不满。卡诺州州长伊卜拉辛·谢卡若曾公开宣称,政府逮捕“希斯巴卫队”成员具有政治目的,企图破坏伊斯兰教法,他同时强调卡诺州政府将继续资助和支持该州的“希斯巴卫队”。尼日利亚穆斯林主体虽不排斥西方民主,但却倾向于由穆斯林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穆斯林担任总统。宗教政治化问题在尼日利亚表现较突出,涉及国家的世俗化进程、伊斯兰教法、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以及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等问题。

在 9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内加尔,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中穆斯林改革派的数量和影响力有所上升。他们提出,塞内加尔应发展成为一个弱化世俗性、强化伊斯兰取向的国家,同时不断批评苏菲教团主要领导人,指责其与迪乌夫政权交往过密。尽管如此,在塞内加尔,传统的伊斯兰教领导层仍受到绝大多数塞内加尔穆斯林民众的支持,^②但伊斯兰主义势力对塞内加尔国家的世俗性构成了一定挑战。除诉诸暴力外,“伊斯兰党”、“争取伊斯兰自由民主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还试图通过竞选上台实现其政治目的,扬言要仿效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通过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① “希斯巴(hisbah)”在伊斯兰教义中有“清算日”、“末日”的意思。统治者(政府)要出面扬善惩恶,以使万物遵循伊斯兰教法。

^② Andrew F. Clark, “Imperialism, Independence, and Islam in Senegal and Mali,” *Africa Today*, Vol. 46, Issue 3, 1999, pp. 161-162.

在穆斯林人口占 80% 的几内亚,伊斯兰主义已逐渐在该国扎根。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伊斯兰学校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几内亚国内有数百个不同规模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其中一些通过发展已拥有较大规模。几内亚国内电视节目中宣扬要求穆斯林女性严格按照教义规范着装的现象亦非常普遍。伊斯兰主义在冈比亚和马里近年来有所抬头,由此带来的动荡、骚乱甚至是政变时有发生。2015 年 12 月 11 日,冈比亚总统叶海亚·贾梅在一次政治集会后宣布,“冈比亚现在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冈比亚也成为继毛里塔尼亚之后非洲大陆的第二个伊斯兰共和国,这在全球也是屈指可数。但事实上,冈比亚宪法规定该国是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国家。马里的伊斯兰教过去素以温和和包容著称,曾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典范。但近年来,随着多党民主的引入、瓦哈比教派的复兴、“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等恐怖组织的扩张及跨国渗透,马里北部正逐步陷入动荡。^① 2015 年 11 月,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遭遇恐怖袭击,以及 2016 年 6 月该国北部加奥联合国维和营地遇袭事件均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为。

此外,在布基纳法索、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甚至科特迪瓦,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活动也日趋活跃。上述国家的一些黎巴嫩裔商人同“基地”组织联系密切。他们参与黑市走私钻石、黄金、钽矿石等稀有矿石,用获得的丰厚利润资助黎巴嫩真主党、“阿迈勒运动(Harakah al-Amal)”^②甚至是“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③

(二) 东北非和东非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与西非相比,东北非和东非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历史上,东非地区的伊斯兰教具有悠久的苏菲主义的传统,常被称为“大众伊斯兰教(popular Islam)”。苏菲主义通过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关联组织吸引大批信徒,构成了非洲许多国家重要的社会基础。富有魅力的宗教领袖对苏菲教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各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教长通常在非洲国家的政治领域也有立足之地。^④ 东非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瓦哈比派和萨拉菲派^⑤思想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大,近几十年来,苏菲主义的生存空间经常受到瓦哈比教和萨拉菲派的挤压和挑战;二

① 参见李文刚:《马里的伊斯兰教与民主化》,载《世界宗教文化》2013 年第 3 期,第 56-62 页。

② “阿迈勒运动”系黎巴嫩政党,成立于 1974 年,其前身为“被剥夺者运动”,是重要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曾拥有民兵约 6,000 人。该政党现部分已解散,余部集中在黎巴嫩南部。

③ Ricardo Laremont and Hrach Gregorian, “Political Islam in West Africa and the Sahel,” *Military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6, pp. 30-31.

④ Knut S. Vikor, “Sufi Brotherhoods in Africa,” in Nehemia Levtzion and Randall L. Pouwels, eds.,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41-468.

⑤ “萨拉菲”系阿拉伯文 *Salaf* 的音译词,指遵守早期伊斯兰教传统的穆斯林,萨拉菲派大多都是伊斯兰主义者。

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不断涌现,突出表现为索马里“青年党”不时发动恐怖袭击,挑战地区安全秩序。

1983年,苏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做法,引起了苏丹南部信仰基督教和传统宗教的非洲土著黑人及其他部落民众的不满,“南方问题”开始显现。南方黑人军官约翰·加朗发动反政府武装叛乱,建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后发展成为苏丹南部最大的反政府组织。该组织主张建立社会经济平等、公正和政教分离的社会,平等分配国家权力和资源。持续22年的苏丹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2005年苏丹北南双方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同年7月,苏丹总统巴希尔签署成立苏丹民族团结政府的过渡时期宪法。该宪法规定:过渡期时长为6年,在过渡期内苏丹南北保持统一,建立南北两套立法系统,南方10个州成立统一的南方政府,北方仍维持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政府;过渡期结束后,南方可通过民族自决方式决定南方的政治地位。2011年1月,苏丹南方举行公投,并于同年7月成立独立的南苏丹共和国。^①至此,苏丹一分为二,受到伊斯兰主义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是苏丹分裂重要的催化剂。

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国,伊斯兰主义组织也异常活跃。20世纪9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就提出,伊斯兰主义的长期存在是埃塞俄比亚安全的最大威胁,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索马里和苏丹两国伊斯兰主义的跨境渗透。“9·11”事件后,埃塞俄比亚密切关注索马里国内敌对的伊斯兰组织的动向,特别是“伊斯兰团结组织(Al Ithaad al Islamia)”的动向。^②在索马里,伊斯兰教曾是各部落寻求身份认同、创建民族国家的核心凝聚力,被奉为“国教”。但自20世纪90年代索马里陷入内战以来,伊斯兰主义发展迅速,并得到索马里民众的普遍支持。^③2008年,索马里过渡政府通过与各方进行谈判实施伊斯兰法,谋求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实现和解,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但反政府武装“青年党”和“伊斯兰党”拒绝与新政府对话,并联合武装占领首都摩加迪沙的大部分街区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暗杀多名政府要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④直到2012年11月,索马里内战爆发21年后,该国才成立了正式的政府,但伊斯兰主义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远未停止,并泛滥至周边国家和地区。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伊斯兰主义者极力扩大伊斯兰教法的实施范

^① 《苏丹共和国》,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zft/chn/ltida/ltij/cyg/sd/t931907.htm>, 登录时间:2017年1月28日。

^② David H. Shinn, “Ethiopia: Coping with Islamic Fundamentalism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Africa Notes*, CSIS, No. 7, February, 2002, pp. 1-7.

^③ 樊小红:《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初探》,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0期,第38-43页。

^④ 《索马里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550/1206x0_678552/, 登录时间:2017年1月28日。

围,在酒吧制造多起爆炸事件,并殴打他们认为着装不当的妇女。在赞比亚,警方在 2003 年 7 月对一所伊斯兰教学校突击检查时发现,近 300 名年龄在 4~10 岁的学生被禁锢在牢笼一样的地方,并被强迫学习军事技能和阿拉伯语。在肯尼亚,基督徒占该国总人口的 78%,穆斯林只占 10%。长期以来,肯尼亚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和平相处,共同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在伊斯兰主义的冲击和“基地”组织影响下,肯尼亚的穆斯林也要求实行包括断肢、石刑等刑罚在内的伊斯兰教法。肯尼亚伊玛目和宣教者理事会主席甚至警告说,如果伊斯兰教法无法得到推广,肯尼亚滨海省和东北省的穆斯林便从该国分离出去。肯尼亚基督徒都担心,一旦伊斯兰教法在肯尼亚被广泛推行,整个国家或因宗教战争陷入分裂。与此同时,部分东非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建立了密切联系。1998 年 8 月,“基地”组织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几乎同时制造了两起炸弹袭击事件,导致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2002 年 11 月,“基地”组织先在蒙巴萨机场向以色列客机发射导弹,接着又在以色列游客聚集的一家宾馆发动自杀性袭击,导致近百人伤亡。参与上述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除了来自阿拉伯国家外,也有来自肯尼亚国内的。肯尼亚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多项措施来应对伊斯兰主义对本国政治和社会安全的挑战。但是,只要肯尼亚穆斯林作为少数派所遭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边缘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伊斯兰激进主义在肯尼亚发展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

(三) 南部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在南非,穆斯林虽是少数派,但具备了较强的政治动员知识和能力,在其聚居地西开普省、夸祖鲁—纳塔尔省和高腾省的地方政治中颇具影响。成立于 1994 年的非洲穆斯林党(Africa Muslim Party)虽然整体势力较弱,但仍积极参加 1994 年 4 月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首次民主选举。从表面看,非洲穆斯林党的伊斯兰色彩比较浓厚,但实际上其纲领与其他政党差异不大,基本上是一个世俗化的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民主化影响不大,只在地区选举中有一定影响。贾玛党(Al Jama-ah)是南非穆斯林青年于 2007 年成立的一个政党,该党具有明显的激进主义倾向。贾玛党主张在南非引入伊斯兰教法,是南非首个明确提出该主张的政党。贾玛党宣称与南非世俗政权的斗争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延续,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南非穆斯林青年政治网络社群,从南非穆斯林历史上反抗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发和动员穆斯林参加选举。

南非最激进的伊斯兰政党当属 1994 年成立的伊斯兰统一大会党(Islamic Unity Convention)。该党以西开普省为基地,囊括了 250 多个穆斯林团体。与上述两个政党不同,伊斯兰统一大会党成立伊始就号召穆斯林抵制大选,对南非的和平与和解进程持排斥态度。大多数穆斯林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热情的鼓舞下,对该党的

这一号召并没有理睬,但伊斯兰统一大会党始终没有改变对伊斯兰事务的专注态度和抵制政治的立场。此外,该党与暴力倾向明显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反对黑帮与毒品之人(People Against Gangsterism and Drugs)”关系密切,并与在南非极力推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一个组织结成联盟。在“伊斯兰革命是唯一出路”口号的指引下,伊斯兰统一大会党试图将南非转变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该党还通过自己注册成立的“786 电台”(1995 年 9 月首播)播放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的节目。2005 年,该党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要求南非政府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理由是以色列企图摧毁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这一举动让南非一些穆斯林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更值得关注的应是消除贫困和打击犯罪等南非穆斯林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不是伊斯兰世界的事务。^①

总之,上述三大伊斯兰政党构成了伊斯兰主义在南非的代表,其中非洲穆斯林政党最温和,其主张在穆斯林大众中能够引起一些共鸣;贾玛党和伊斯兰统一大会党表现极为激进,其穆斯林身份认同与南非公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贾玛党和伊斯兰统一大会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跨国伊斯兰网络和运动的影响,其目标也颇具国际性,如解放巴勒斯坦和阿克萨清真寺等。另外,贾玛党和伊斯兰统一大会党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推行世俗宪法的新南非处于尴尬的境地,它们主张在南非穆斯林中推行伊斯兰教法、死刑、妇女戴面纱的做法,遭到了推崇世俗化的南非人(包括穆斯林)的批评。一些采取暴力手段、滥用刑罚等策略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更是让南非民众胆战心惊,不仅让外界对南非穆斯林的看法产生偏差,也给温和穆斯林以合法手段参与政治蒙上了阴影。

在南非,“反对黑帮和毒品之人”是一个具有明显暴力倾向的极端组织。起初,该组织只是一个旨在消除社区犯罪和毒品的民间组织,后逐渐演变为一个极端组织。该组织成员常常头缠巴勒斯坦式的头巾招摇过市,他们创建无毒品社区的方式之一就是直接在毒贩子的住所附近进行游行,并将其群殴致死,甚至焚尸街头。这些极端行径在南非这样一个推行法制的民主国家显然是骇人听闻。越来越多的南非人认识到,该组织已背离了其创建时的宗旨,变成了包括穆斯林极端分子甚至基督徒、犹太教徒在内的极端组织。“反对黑帮与毒品之人”认为,非国大政府并没有对南非的穆斯林提供保护,因而其成员频频向政府发难。该组织的极端分子已针对西方游客、穆斯林温和派人士和警察实施了百余起暴力袭击事件。此外,该组织还同南非一个规模较小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组织规模虽然较小,但很有可能在西开普地区提出推行伊斯兰主义的日程,对南非社会和政局稳定的潜在威

^① M. A. Mohamed Salih,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in Secular South Africa,” in M. A. Mohamed Salih, ed., *Interpreting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91–203.

胁不容忽视。这些组织所采取的暴力手段、激进措辞以及召开极具煽动性的记者招待会等活动方式已对广大普通穆斯林通过正常途径参与南非政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①此外,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对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打击,许多伊斯兰学校的学生为躲避政府打压,纷纷逃到南非、马拉维等非洲国家,随之而来的是宗教极端势力向南部非洲的渗透。

二、伊斯兰主义在非洲蔓延的原因

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蔓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又有非洲国家自身的原因。

首先,政治民主化风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为伊斯兰主义的兴盛提供了政治空间。有学者指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正是假民主变革之途在北非迅速膨胀并将触角伸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②。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以及民主化浪潮对非洲的影响,非洲穆斯林参政议政的意识显著增强,政治参与的渠道日益多元,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为各类伊斯兰组织和政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伊斯兰政党与非洲民主化的问题,属于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范畴,是伊斯兰主义者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国家是绝大多数非洲伊斯兰国家政治制度的主流,民主化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多数非洲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化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因素对穆斯林选民投票意愿的影响,一些政客便利用宗教认同来为自己拉选票。在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非洲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化前景正受到严峻考验。按照选举民主的基本要求,伊斯兰主义或可将其宗教组织政治化,改造为伊斯兰政党^③,或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党参加选举,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这些伊斯兰政党宣扬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立场与多数国家奉行的世俗制相悖,不仅引起当政者的担忧,也引发当事国国内基督徒的担忧。

其次,非洲伊斯兰主义潮流受到伊朗输出革命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苏丹的支持。可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非洲穆斯林开展激进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榜样。在东非,颇具影响的穆斯林政治人士发表的激进政治观点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启发,其中谢赫·赛义迪·穆萨最具代表性。穆萨虽自称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伊斯

^① Weasahl Agherdien, “Islam in South Africa,” *CSIS Briefing Notes*, Vol. 3, No. 2, September, 2000.

^② 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5 页。

^③ 非洲国家对伊斯兰党的态度大致有三类:一是绝大多数国家明确禁止成立基于宗教教义的政党;二是苏丹、索马里、南非等国允许建立伊斯兰政党;三是宣布伊斯兰政党为非法,但不具有政治合法性的伊斯兰党影响仍比较大,如肯尼亚伊斯兰党。

兰教团,但其著作等身,依靠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了东非伊斯兰运动的发展。^①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下,1980年马里政府成立了马里伊斯兰团结与进步协会,目的是处理伊斯兰改革派和苏菲教团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负责协调来自利比亚和沙特、伊朗等海湾国家对于在当地建立清真寺、伊斯兰教育和文化中心的资金援助。此外,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学生会(Muslim Students Society)等学生组织更是热衷宣扬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模式,南非部分伊斯兰激进组织也宣扬要效仿伊朗。^② 由哈桑·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已被公认为一股横跨非洲大陆的力量。图拉比认为,苏丹应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在其号召下,1991年4月,55个国家的穆斯林组织代表云集喀土穆,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图拉比当选为秘书长。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较有影响的伊斯兰组织代表都参加了这场被西方舆论称之为“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聚会”的成立大会。1995年3月,第三届“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在喀土穆举行,出席国家多达85个,被西方称作“新的伊斯兰主义国际”。此外,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生前对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蔓延也发挥了一定影响。2000年,卡扎菲访问西非国家贝宁时甚至宣布,他的目标就是“促使伊斯兰教在非洲获得胜利”^③。尼日利亚高原州在2010年1月和3月发生暴力冲突后,卡扎菲甚至呼吁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分别建立两个国家,以免再次发生冲突。卡扎菲公开分裂尼日利亚的言论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引起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如今,西方国家虽然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利比亚的局势陷入失控,助长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等极端势力在北非坐大并向萨赫勒地带蔓延。

再次,埃及、沙特等国持续向非洲国家输出伊斯兰激进思想。多年来,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宗教慈善机构对东非和非洲之角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提供资助。在西非,沙特资助的瓦哈比派教徒在传教活动中与温和穆斯林群体之间多次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尼日尔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度较高,沙特、摩洛哥和利比亚是其主要援助国。在接受经济援助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向尼日尔输出意识形态。一些激进的尼日尔穆斯林认为,只有奉行更具战斗性的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教法统治,尼日尔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消除腐败和改善经济。当然,在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反恐行动中,一些慈善机构涉嫌被迫或自愿与恐怖组织的金融链条存在牵连。^④

^① Eva Evers Rosander and David Westerlund, *African Islam and Islam in Africa: Encounters between Sufis and Islamists*, London: Hurst, 1997, pp. 115-116.

^②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Pride, Faith, and Fear: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

^③ Paul Marshall, “Radical Islam’s move on Af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6, 2003.

^④ Ricardo Laremont and Hrach Gregorian, “Political Islam in West Africa and the Sahel,” pp. 30-31.

这些慈善机构担心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如冻结资产等)而蒙受更大损失,因而在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时更为谨慎。

最后,非洲国家的国内矛盾为伊斯兰主义的蔓延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落后、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动荡、政变频仍、失业率高,年轻人感到失望和不满。^①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为宣传谋求社会公正、消除流弊的伊斯兰主义提供了孕育和发展的土壤,这解释了伊斯兰主义总是在贫穷国家、在贫穷人群尤其是年轻群体中盛行的原因。马里北部、尼日利亚东北部、非洲之角都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加之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当地民众生活困难,极易受极端主义势力小恩小惠的笼络或暴力裹胁。在部分非洲国家,一些穆斯林集团已不甘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参政意识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而不断增强,肯尼亚伊斯兰党的崛起便是明证。^②此外,在尼日利亚等伊斯兰势力影响较大的国家,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权力之争始终都存在,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谋求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的活动使基督徒忧心忡忡。宗教矛盾、教派矛盾、民族矛盾等相互叠加,为伊斯兰主义的盛行创造了条件。此外,在一些非洲国家,穆斯林群体经济地位的变化也与伊斯兰主义的盛行不无关系。东非肯尼亚的穆斯林群体因经济地位的上升而产生了问鼎政治的诉求,西非科特迪瓦穆斯林因经济利益受损而与该国天主教徒关系紧张。科特迪瓦开国总统乌夫埃·博瓦尼是非常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他依然能获得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仰徒的支持,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科特迪瓦的经济发展卓有成效。然而,随着科特迪瓦经济的衰退,受冲击最厉害的当属多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群体,他们逐渐从昔日博瓦尼的支持者转变成反对者,穆斯林认为博瓦尼只对自己的天主教选民情有独钟,对其他科特迪瓦人的诉求置之不理。博瓦尼所建的雄伟的和平圣母院在穆斯林看来也成为天主教徒主宰国家事务的象征。科特迪瓦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和平共处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科特迪瓦政局不稳定的一大隐患。^③总之,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勃兴,与非洲国家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多党民主化的多重影响、经济社会欠发展以及民族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均存在密切关系。

①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p. 42.

② Arye Oded, "Islamic Extremism in Kenya: The Rise and Fall of Sheikh Khalid Balala,"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Vol. 26, No. 4, 1996, pp. 406-415.

③ Lansine Kaba, "Islam in West Africa: Radicalism and the New Ethic of Disagreement, 1960-1990," in Nehemia Levtzion and Randall L. Pouwels, eds.,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8-199.

三、伊斯兰主义对非洲国家的影响

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蔓延已对该地区国家的政局、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非洲国家间关系及其与西方的关系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伊斯兰主义加深了非洲国家内部的原有矛盾,造成政局和社会动荡。伊斯兰主义组织大多持反世俗政权的立场,各国政府一般都将其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在政府打压下,非洲伊斯兰主义运动出现极端化趋势,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极端武装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挑战当局。例如,“博科圣地”起初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在尼日利亚政府的不断打压和西亚北非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及渗透下,它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极端恐怖组织。此外,受伊朗支持的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属什叶派激进组织,同样因宣扬建立什叶派国家与尼日利亚军警频繁发生流血冲突。从发展趋势上看,采用暴力手段逐渐成为伊斯兰主义者对抗政权的主要策略,并得到越来越多青年群体的支持。伊斯兰主义势力同世俗政权的对抗使得一些当事国的政局更加动荡,甚至濒临内战边缘。非洲国家大多是多民族、多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国家,民族国家构建历史很短。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活动给以往大体上能够和平共处的民族宗教关系不时带来麻烦,严重阻碍了非洲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

其次,伊斯兰主义的蔓延对非洲国家间关系构成重要挑战。苏丹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引起了邻国的不安,这些国家同苏丹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紧张。这些国家指责苏丹收容和帮助在本国受到缉捕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到苏丹避难,并接受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苏丹同伊朗关系的发展也加深了地区关系的紧张。索马里的局势对周边的国家安全形势产生了不利影响,东非伊斯兰主义的泛滥与索马里局势失控存在重要关联。2013年9月,索马里“青年党”在邻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大型商场制造了严重的恐袭。再如,阿尔及利亚南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已蜕化为恐怖组织,其活动也已严重影响到地处萨赫勒地带的马里、尼日尔、乍得和毛里塔尼亚等多个西非国家的安全环境。^①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活动也对周边邻国形成辐射。此外,伊斯兰主义的活动还影响着非洲国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因伊朗支持尼日利亚什叶派的“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尼伊关系时常出现不睦。同时,伊朗和沙特的纷争往往会波及至非洲国家,突出表现在2016年初伊沙断交引发了与沙特关系密切的非洲国家纷纷选择与沙特站在一边。伊沙断交后,苏丹政府要求在喀土穆的伊朗外交官在两周内离开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也很快发表声明,表示了与沙特的团结。索马里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slamist Terrorism in the Sahel: Fact or Fiction?,” *Africa Report*, No. 92, March 31, 2005, pp. 1-2.

和科摩罗先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一时间,伊沙外交危机的冲击波越过红海,波及到了东非沿海国家,并持续向西,就连西非的尼日利亚也出现了连锁反应,因为尼日利亚与伊朗的关系正因该国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问题而比较紧张。当然,非洲伊斯兰国家依据教派站队还有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利益等更多深层次的原因。

最后,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阻碍了非洲当事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近年来,由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频频制造恐怖活动,一些非洲国家的旅游业遭受重创;在一些伊斯兰主义势力发展迅猛的国家,外国投资者更是望而却步,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该国东北部本身就是贫困之地,“博科圣地”的疯狂肆虐加重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经济活动和外国投资无从谈起。在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边境贸易,也因恐袭和多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而受到限制,民众更是苦不堪言。^①此外,为打击“博科圣地”,尼日利亚政府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经济恶化使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青年因感到前途渺茫而对政府产生不满,容易被极端势力乘势引诱入伙,形成恶性循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还造成马里北部历史名城通布图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损坏,是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

四、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制约因素

作为穆斯林的生活传统,非洲伊斯兰教将长久地延续下去。伊斯兰教的政治性决定了其生存地区只要存在违背伊斯兰精神和教义的现象,以及造成该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根源尚未消除,伊斯兰主义者就会继续对抗现行政权,伊斯兰主义运动也会继续发展下去。但从长远看,伊斯兰主义运动在非洲的发展仍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伊斯兰主义理想与政治现实背离。伊斯兰主义虽存在反对道德败坏和腐化堕落、重新确立伊斯兰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的积极面,但其主张很大程度上脱离现实和违背客观规律。它反对借鉴西方或其他非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经验,却无法提出一整套适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方案。另外,它主张实行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政权,但伊斯兰教法对如何正确建立伊斯兰政府却缺乏符合现代

^① Facinet Sylla, “Boko Haram: A Threat for the Future and a Threat to Developmen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fdb.org/en/blogs/measuring-the-pulse-of-economic-transformation-in-west-africa/post/boko-haram-a-threat-for-the-future-and-a-threat-to-development-13994/>, 登录时间:2017年1月5日。

政治制度的实现路径,无法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难题。^① 尽管历史上伊斯兰国家具有政教合一的传统,但近代以来事实上的政教分离已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制度的主流。^② 因此,伊斯兰主义宣称的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的主张仍缺乏现实基础和可行性。冈比亚总统贾梅不顾宪法中对“政教分离”的规定以及国内基督徒少数派的反对,强行宣布冈比亚为伊斯兰共和国,实际上缺乏政治合法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洲伊斯兰主义者口口声声说反对西方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博科圣地”字面意思就是“西方教育是罪恶”、“西方教育应禁止”,但他们却无时不在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和极端教义。

其次,伊斯兰主义运动内部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且派系林立,难以形成整体力量。例如,尼日利亚穆斯林绝大多数是苏菲派信徒,反对“博科圣地”的主张和暴行。即使在“博科圣地”内部,也有不同派别之分,以至于远在中东的“伊斯兰国”组织也要根据“博科圣地”的内部斗争情况任命其“西非省”的新头目。^③ 此外,尼日利亚北部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兴起后带来的教派问题,加深了尼日利亚国内伊斯兰问题的复杂化。索马里就是因为各派系间的相互争斗而陷入旷日持久的战火。马里北部的情况亦是如此,既有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运动组织“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Movement for Unity and Jihad in West Africa)”,也有“基地”组织和“博科圣地”及其分支。总之,非洲国家的穆斯林在民族、教派、地域、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较大,各国的民族结构和政教关系各异,因此伊斯兰主义在非洲各国的发展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如前所述,伊斯兰主义对世俗政权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非洲各国对伊斯兰主义加强了管控,客观上抑制了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再次,伊斯兰主义兴起的一些经济因素有可能通过发展被消除。社会经济欠发展是非洲伊斯兰主义兴起的重要内因之一。如果国家能够保持稳定,民众能安居乐业,大多数穆斯林并不反对在世俗政府的管理下生活。因此,如果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伊斯兰主义者就难以找到对抗政权的市场。此外,少数极端分子滥用暴力、制造骚乱的恐怖主义行为,即使是在穆斯林群体内部也是不得人心,日久定会失去支持,“伊斯兰国”组织陷入困境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保持高压态势固然重要,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铲除这些思想滋生的土壤。为此,非洲国家应自上而下推行相关措施,包括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和

^① 李伟建:《阿拉伯非洲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现状、影响及前途》,载《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4期,第39-40页。

^②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序言第9页。

^③ 2015年,“博科圣地”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2016年8月,“伊斯兰国”组织宣布阿布·穆萨布·巴尔维纳(Abu Musab al-Barnawi)为其“西非省”新领导人,取代此前的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

改善民生,以加强政权合法性;推动民族国家一体化,用国家民族认同取代部落、地方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消除腐败,提高治理能力;大力推进去极端化工作;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等。

最后,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受国际大环境制约和美国反恐政策的影响。伊斯兰主义总体上是反西方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以来还不断加大对西方目标的袭击。1998 年 8 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美国使馆发生爆炸,造成包括 12 名美国人在内的 256 人死亡,近 5,000 人受伤。^①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行政令,禁止同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进行交易。肯尼亚政府很快关闭境内许多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救济机构。这些伊斯兰非政府组织被关闭后,肯尼亚国内各类伊斯兰教活动陷入了困境,对肯尼亚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肯尼亚穆斯林自然而然地认为,所谓“反恐战争”就是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战争。美国政府将穆斯林划分为伊斯兰主义者、传统派、现代派、世俗派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穆斯林的上述看法。^②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加强了在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马里、尼日尔的反恐力度。同时,美国、英国同利比亚的关系开始解冻,美国也赞扬了与苏丹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并将沙特视为重要的反恐合作伙伴,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限制。“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不断推进,东非国家日益受到西方关注。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行动上将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和索马里的“青年党”列为三大主要打击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西方国家以何种方式参与非洲的和平安全事务,都应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基本行为规范框架内进行,否则于事无补,后患无穷。

总之,伊斯兰主义作为非洲政治进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将会继续存在。虽然伊斯兰主义运动仍不乏在某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或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可能性,但要想在非洲获得更大的发展也不现实,这是由其自身特点和非洲国家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非洲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以及伊斯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导致非洲各国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角度看,加强对非洲伊斯兰主义问题的研究,应成为今后国内学界探索的一个重点问题。

(责任编辑:邹志强)

^①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Pride, Faith, and Fear: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p. 121.

^② Cheryl Benard, *Civil Democratic Islam Partners, Resources and Strategies*, RAND, USA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03.